

從岸信介到安倍晉三再到高市早苗

——日本軍國主義如何死灰復燃

深度評

不徹底的清算

二戰後，日本的戰爭罪責始終未得到徹底清算，使日本軍國主義成為休眠火山，隨時可能死灰復燃。

1945年8月15日宣讀的日本《終戰詔書》雖實質上承認了日本軍事失敗的現實，但通篇未出現「投降」「戰敗」字樣，以「終戰」（戰爭終止）代指投降；將侵略戰爭美化為「為帝國生存與東亞穩定」「為解放東亞而努力」；對所謂盟邦「表示遺憾」、對死傷日軍感到「五臟為之俱裂」，但對遭受深重傷害的亞洲各國卻毫無道歉之意；強調原子弹「頻殺無辜」，卻迴避了日軍侵略各國在先的事實。當時宣布投降的鈴木貫太郎內閣在宣布內閣總辭職時，列出的原因甚至都不是日本戰敗，而是在結束戰爭的問題上「兩次麻煩天皇聖誕」。從內部而言，日本從戰爭發動者，到軍國主義思想文化，以及國家責任等層面的反思均不徹底。

二戰結束後不久，「冷戰」鐵幕拉開，日本尚未完成自身去法西斯化、去軍事化，便被迅速納入西方陣營，被再次武裝。為將戰時右翼分子清除出戰後政治生態，日本曾「整肅」戰犯、舊軍人、右翼勢力頭目以及相關企業機構負責人。但到1951年底，被戰後「整肅」的21萬多人中，有20萬1507人被免於處理。戰後日本高度承接戰前政治勢力，大量軍國主義分子未被清算反而重返政壇、軍界和財界。

影響最深遠的一個例子，是甲級戰犯嫌疑人岸信介。

岸信介1936年赴日軍統治下的「偽滿洲國」，充任「產業部次長」和「總務廳

次長」，是偽滿當局的實權人物之一，主宰偽滿洲國經濟命脈。1942年10月，岸信介出任東條英機內閣商工大臣，後改任國務大臣兼軍需省次官等要職。1942年在法西斯團體「大政翼賛會」支持下，當選為眾議員。1945年9月，因在侵略戰爭中作惡多端，岸信介與東條英機等人被指定為甲級戰犯嫌疑人，關進巢鴨監獄3年，因為在塞班島戰役上與東條英機有過爭執而得以免除被起訴。1948年12月，岸信介獲美軍當局釋放。但他仍然是「整肅」對象，本無機會再掀風浪。但因「冷戰」爆發和美國佔領軍的政策轉換、「整肅」解除，他重新進入政壇，直至1957年出任首相。岸信介上台後，推動一系列逆歷史潮流而動的政策，日本的政治風向迅速右轉。1987年8月7日，自詡為「昭和妖怪」的岸信介去世。日本媒體蓋棺論定，把岸信介的一生分為三個階段：一是充滿軍國主義思想的戰犯；二是戰後日本保守勢力的統一者；三是《日美安保條約》的修訂者，日美同盟的最強烈鼓吹者。

否定歷史大行其道

20世紀60年代直至80年代，日本經濟高速增長，經濟大國地位日趨鞏固，日本政府想要擺脫戰後體制束縛的想法更加強烈。與此伴生的，日本社會產生從歷史經驗中尋找成功因素的社會潮流，社會心態逐漸變為全盤肯定日本歷史文化傳統，進而衍生出挑戰戰後國際秩序、否認殖民及軍國主義侵略罪行的錯誤思潮。

20世紀80年代中期後，日政府提出「戰後政治總決算」，社會中出現了否認侵略歷史、詆毀「東京審判」亂象。以「神道政治聯盟」「日本守護會」「守護日本

國民會議」「日本會議地方議員聯盟」等為代表的右翼團體強調推翻「自虐史觀」、呼籲參拜供奉甲級戰犯的靖國神社等。

21世紀伊始，日本政壇保守勢力開始全面推進國民歷史認知重構，以所謂「正常國家」為戰略目標，試圖擺脫戰後體制。2001年至2006年，時任日本首相小泉純一郎6次參拜靖國神社。2006年，安倍晉三出任首相，積極推動「修改憲法解釋」「解禁集體自衛權」，將防衛廳升格為防衛省。在2012年第二次出任首相後，安倍參拜靖國神社；修改延續40多年的「武器出口三原則」，將日本武器及其技術出口從原則上禁止變為原則上放行；強行推動國會通過新法案，規定若被認定構成「存亡危機事態」便可行使集體自衛權，從根本上突破「專守防衛」原則。2015年日本戰敗投降日前，他發表「安倍談話」，單方面宣稱將「清算」並終止日本向中國、韓國、朝鮮等戰爭受害國「承擔的無休止的道歉義務」，妄圖以「歷史切割」淡化乃至推卸日本應承擔的罪責。卸任後更是公然放話「台灣有事就是日本有事」。

值得一提的是，岸信介是安倍晉三的外祖父。熟悉安倍晉三的人都認為他遺傳有岸信介的政治基因，安倍晉三也多次承認，自己受外祖父影響最大，他在自傳中直言無隱地稱「我的政治DNA更多地繼承了岸信介的遺傳」。

此後，日本政府歷任領導人繼續參拜或以繳納「玉串料」（祭祀費）、供奉「真榊」等形式變相參拜靖國神社；持續強化廣島、長崎「原爆地」的「受害者」身份，淡化日本軍國主義的「加害者」身份，博

取國際社會同情；不斷擴軍備武，軍費逐年攀升；放任日本右翼勢力篡改歷史教科書表述、否定或美化侵略戰爭。這些行徑表明，日本政府輕率地看待或迴避戰爭罪責，為軍國主義復活提供了土壤。

軍國主義復辟已成現實威脅

2025年10月，高市早苗出任首相。高市與安倍晉三關係密切，高市背後的勢力，主要繼承於自民黨裏曾經最大、最有權勢的派系之一——安倍派，也叫「清和政策研究會」。安倍派是自民黨內部最保守的派系，最大特點就是強烈的民族主義和保守主義，追求修憲和對華強硬。安倍執政期間，高市曾先後擔任內閣府特命擔當大臣、自民黨政調會長、總務大臣等黨政要職，高市自視為「安倍路線」的堅定繼承人，外界也將她當成安倍的「政治門生」。這一點從今年年初高市手捧安倍遺像參拜伊勢神宮的一幕中可見一斑。但是同安倍相比，高市在試圖實現「正常國家化」甚至「軍事大國化」的路上顯然表現得更為激進和大膽。

政治上，高市公然違背國際法，挑戰二戰後國際秩序。2025年11月7日，她在國會答辯時將所謂「台灣有事」與日本「存亡危機事態」掛鉤，暗示武力介入台海，自日本戰敗以來首次公然向戰勝國發出武力威脅，嚴重侵犯中國主權和領土完整。高市明確將「修改和平憲法第九條」列為執政核心目標，妄圖徹底刪除「不保有戰力」的條款，同時增設「緊急事態條款」，為日本自衛隊實現「軍隊正常化」鋪路。

軍事上，高市政權為日本「再軍事化」披上「為應對威脅」的虛偽外衣，通過不動炒作「中國威脅」「朝鮮導彈」「移民

衝擊」「日本被圍」等敘事，變本加厲地擴軍備武。2025年提前將防衛費佔比提升至GDP2%，2026年度防衛費預算再創歷史新高，實現十四連增，規模在西方國家中居於第二位。高市政權還擬修改「安保三文件」，放寬武器出口限制，為大規模出口武器甚至殺傷性武器鋪平道路。首相官邸高官妄稱日本應當擁核武器，高市更暗示不排除引入核動力潛艇。高市內閣在軍事突破上邁出的步伐之大可謂空前。

意識形態上，高市長期堅持錯誤二戰史觀。戰前日本軍國主義曾用《教育敕語》蠱惑日本國民「奔赴戰場，敢於為天皇奉獻生命」，而高市自幼便熟讀《教育敕語》，早年曾公開稱讚「非常精彩」。2006年高市進入安倍內閣後，連年參拜靖國神社，多次在公開場合否認「南京大屠殺」、強徵「慰安婦」等事實，並竭力主張修憲，要把自衛隊改為「國防軍」、擁有「宣戰權」等。值得高度警惕的是，高市還曾同日本新納粹團體「日本納粹黨」頭目在日本國旗前合影，並為美化希特勒的書籍《希特勒的選舉策略》一書作序。

由此可見，高市發表涉台錯誤言論絕非孤立事件，而是傳遞出極其危險的信號。高市就任日本首相短短3個月，日本戰略走向就加速右傾，謀求「再軍事化」走向實質階段，軍國主義復辟已成為現實威脅。二戰歷史殷鑿不遠。經歷過二戰慘痛教訓的亞洲各國和日本民眾必須高度警惕高市政權和日本右翼勢力的危險動向，堅決防止悲劇重演，共同維護二戰後國際秩序，維護來之不易的、和平穩定的亞洲家園。

國際問題觀察員

制定香港發展願景 對接國家「十五五」規劃



議事廳

中共二十屆四中全會通過的國家「十五五」規劃建議，聚焦強化科技自立、穩定經濟、深化兩岸交流、推進共同富裕等多方面的發展目標。其中，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全面增強自主創新能力，搶佔科技發展制高點，不斷催生新質生產力，為香港以創新科技為驅動力、構建「南金融、北創科」發展，提供了清晰明確的指引與強大的發展動力。

剛剛過去的2025年，是「十四五」規劃的收官之年，亦都是「十五五」規劃的謀篇布局之年。在過去的五年，面對世紀疫情、中美貿易戰，以及地緣政治加速演變等重大挑戰，中國經濟頂壓前行，取得了巨大成就：貿易順差在去年首次突破1萬億美元大關；GDP達到140萬億人民幣，增長5%；人工智能、生物醫藥、新能源產業等新質生產力領域成果豐碩。

受惠於國家發展的強大動能，香港經濟在去年亦實現了穩步的增長：本地GDP增長預期達到3.2%；全年港股IPO集資總額超過2800億港元，穩居世界第一；全球金融中心指數排名第三，並蟬聯全球最自由經濟體；樓市成交量顯著反彈；年度訪港旅客接近5千萬大關，帶動本地零

售業進一步復甦。

「十五五」規劃建議的擬定，是在充分總結過去五年成就與經驗的基礎上，根據新的國內外局勢和內地區域發展需要，提出的一套具有廣泛社會共識的總體發展方案和目標，在凝聚發展共識、引領高質量發展、優化資源配置、促進區域協同融合，以及推動全面可持續發展等方面，具有重要的戰略導向作用。

國家的高質量發展是香港經濟民生建設的牢固基石，「十五五」規劃在實現中國式現代化的進程中具有承前啟後的重要作用。二十屆四中全會通過的規劃建議，亦明確指出要促進香港長期繁榮穩定、支持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務國家發展大局、加強與內地合作、鞏固提升「三大中心」地位、支持香港建設國際創科中心，以及打造國際高端人才集聚高地等目標。

不斷增強國家觀大局觀

「一國兩制」下的香港，最大優勢在於「背靠祖國、聯通世界」。中國是全球經濟增長及平穩運行的火車頭，連續多年為全球經濟成長作出超過30%的貢獻，亦必然是香港社會經濟持續發展的強大引擎。「十五五」規劃必定為香港的長遠發展注入強大動能，令香港在諸多領域可以實現

持續高質量發展，在更好融入和服務國家發展大局中可以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

回歸以來，香港在「一國兩制」的體制下，繼續保持「自由港」的優勢，但過去香港奉行「積極不干預」的市場主導政策，令到政府在經濟發展中的決策力與統籌力都較為有限，限制了香港更好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深度和廣度，亦限制了社會經濟發展的可持續性。值得肯定的是，本屆政府在全力對接國家戰略方面，做了大量富有成效的工作，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社會共識已初步形成。政府現時設有特首政策組作為特首施政的政策研究部門，但從整個政府架構來看，仍然缺乏一個能夠牽頭制定長遠整體發展規劃、有能力統籌協調各個政策局的高層次專責機構，以制定全面對接國家戰略規劃的特區發展願景。

在「由治及興」的新發展階段，香港需要不斷增強國家觀、大局觀，特區政府在全面對接國家戰略的整體統籌協調上，還需要更加積極主動。這並非是要求香港去照搬內地模式，而是要在「一國兩制」的框架之下，充分發揮「兩制」的獨特優勢，高定位、高質量、高效率地制訂並實施中長期發展目標，因地制宜發展新質生產力，令香港在複雜多變的國際環境中保持可持續發展的核心競爭力。

目前，特區多個政策局已經制定了各自的行業發展藍圖，例如《香港創新科技發展藍圖》、《香港旅遊業發展藍圖2.0》、《漁農業可持續發展藍圖》等。這些發展規劃也都同各自對口的國家相關部委進行了縱向溝通協調，體現了特區政府以結果為目標，完善特區治理的施政方向，但就缺乏對於香港未來發展願景的整體統籌規劃。

跨部門協作規劃發展願景

為更好對接「十五五」規劃，建議政府改變以往政策局各規劃行業發展的模式，可研究設立一個能夠協調統籌、推動執行的高層次決策機構，打破跨部門協作的障礙，通力合作制定一套可以得到社會廣泛認可、能夠無縫對接國家發展規劃的總體發展願景，甚至可以創造條件去參與未來國家級發展規劃的制定，讓香港的發展規劃更具全局性、系統性、前瞻性，真正實現與國家發展大局同頻共振。

特首在去年的施政報告中，提出成立由他親自牽頭的北都發展委員會，這是一個好的開始。建議可擴大特首倡議的「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督導組」的功能，除了督導之外，還需要負責制定特區中長期發展總體規劃，並通過建立高效的跨部門統籌

協調機制，進行全局謀劃，整體推進，令到香港各領域發展有機統一，相互促進，形成合力，精準對接國家發展規劃，助力香港更好地融入並服務國家發展大局。

為了更好地規劃並促進特區未來可持續發展，特區政府在新發展時期要應變求變，制訂針對性的改革措施，包括更好地進行機構改革，推動將本港的發展願景與國家的整體規劃緊密關聯，實現香港與國家的同發展、共繁榮。

當前，香港正處於「前有標兵，後有追兵」的激烈競爭環境。面對緊迫的發展任務，需要爭分奪秒的進取精神，要把握好「十五五」規劃的關鍵窗口期，推動將北部都會區等重大發展規劃有機會納入國家發展藍圖之中，從而爭取中央層面對香港更多的政策支持。期待特區政府與各界共同探索，將落實特區行政主導原則與自身的同發展、共繁榮。

當前，香港正處於「前有標兵，後有追兵」的激烈競爭環境。面對緊迫的發展任務，需要爭分奪秒的進取精神，要把握好「十五五」規劃的關鍵窗口期，推動將北部都會區等重大發展規劃有機會納入國家發展藍圖之中，從而爭取中央層面對香港更多的政策支持。期待特區政府與各界共同探索，將落實特區行政主導原則與自身的同發展、共繁榮。

立法會商界（三）議員

外國勢力干預香港法治自暴其醜

都不敢說。

由此亦可見，這項所謂的「決議」充分暴露歐洲議會反華政客的可悲可笑。他們自甘對特朗普無視法治的橫蠻捨棄尊嚴，卻對香港法院855頁完全公開的判詞視若無睹，全然不管法庭對相關法律原則和證據的分析，以及裁定黎智英和三間被告公司有罪的理由。從一開始，這班政客只打著把案件「政治化」的算盤，企圖轉移案中涉及刑事罪行的重點，並藉此將被告塑造成「受害者」、「民主鬥士」的形象。但法庭已經多次清楚說明，被告究竟有沒有犯罪，不是取決於其持有什麼政治立場，而是由客觀證據和法理原則所決定。「悲情牌」或外媒抹黑這些「場外戰術」用得再多，也干預不了香港司法程序，更妄想動搖得了法庭的獨立判斷。

對美國惡行不敢發一聲

不論勾結外國勢力或顛覆國家政權，放縱全世界都是嚴重罪行。美國法典第115章第2385條清晰列明顛覆政府罪，任何蓄

意鼓吹、煽動、勸說或教唆他人有責任、有必要、值得或適於以武力、暴力方式或企圖顛覆或摧毀美國政府者，最高可被判處20年有期徒刑。美國對相關罪行的檢控更是毫不留情，在2021年發生的美國國會山騷亂事件中，超過1200人被逮捕並檢控，多人罪名都與顛覆國家政權相關，其中最重刑期達22年。英國早前實施的新國安法，賦予英國國務大臣只要「合理地相信」任何人可能涉及「外國勢力威脅行為」，便可向法庭申請法令令該人拘捕，禁閉於其居所方圓200里內之任何地方長達5年之久，同時不需知會、不需審訊、不需辯護。而當國務大臣向法庭申請該法令時，除非法庭認為申請「明顯犯錯」，否則必須批出所要求之法令。

全球包括美西方國家無一不將國家安寧定為不能逾越的紅線，如今卻反倒幫香港一衆涉嫌違反國安法的人求情說項，雙標虛偽的一面可謂暴露無遺。即使不說黎智英，昨日開審的「支聯會」案中各被告，包括李卓人、鄒幸彤，均可稱得上「劣跡

斑斑」。例如李卓人多年來收受外國資助，充當「代理人」角色，由其成立的職工盟自1994年起，每年從相關基金會獲取資金，累計約1300萬港元，並與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撥款的美國團結中心等組織聯繫密切。2019年黑暴期間，職工盟催生多個「攬炒工會」，煽動「三罷」行動。香港國安法實施翌日，李卓人即透過視像會議參與美國國會聽證會，乞求對方插手香港事務。同年，他又前往美國與蓬佩奧及佩洛西等政客密談，還竄訪澳洲游說涉港法案。

法庭公正審判不受任何干擾

至於鄒幸彤，作為前「支聯會」副主席，同樣多案在身。2021年，她涉嫌煽惑他人參與非法集會被捕，在社交媒体上聲稱放棄抗爭不是選項，要求支持者「戰鬥到底」。更在記者會上大肆抹黑黑警方國安處正常執法，強硬宣稱不會遵從警方要求交出「支聯會」資料。而在本案正式開審前，鄒幸彤已經動作多多，去年2月，她再提出撤銷公訴書程序，聲稱控方未提供足夠案情，不清楚控方所指的「非法手段」為何，不知如何準備，還就專家證供提出新要求。

日前高等法院在駁回相關申請的判詞中，已經對鄒幸彤提出的問題一一作出有力反駁，強調本案雖然範圍寬闊，但控方已就非法手段所指限制了範圍，相信有足夠資料供她了解指控。而控方亦毋須就鄒幸彤罪行詳情特地列出犯罪意圖，只須在舉證時證明。究竟鄒幸彤的涉案言行是否構成「非法手段」，才是審訊的重要議題。

事實屢屢證明，無論案件涉及什麼議題、被告涉及什麼背景，香港司法機構一貫維持其高度專業性，只針對具體存在的客觀證據和法律原則，對被告作出審判。就算有人想對審訊「一拖再拖」，也不過是暴露其心虛一面，就如同「35+顛覆政權」案和黎智英案一樣，香港社會相信「支聯會」案的審訊也能還原案件真相，對各被告作出公平、公正的裁決，並彰顯香港高度的法治精神，以及維護國家安全的堅定決心。